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导论课程

# 阅读文选

(中文部分)

天津师范大学跨界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培训基地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2005年1月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导论课程

# 阅读文选

(中文部分)

天津师范大学跨界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培训基地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2005年1月

# 目 录

1. 妇女史的挑战 (杰达·勒纳, 蔡一平译) ..... 1
2. 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 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 (吉斯拉·鲍克, 蔡一平译) ..... 6
3. 历史科学有性别吗? (Bonnie G. Smith, 张日元译) ..... 15
4. 女性主义史学与中国妇女社会史: 当代西方研究的  
批判及妇女史学的展望 (叶汉明) ..... 26
5. 历史研究的性别维度与视角 (杜芳琴) ..... 45
6. 女权主义立场——发展女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南希·哈特索克, 王向贤译) ..... 55
7. 对社会性别和政治的进一步的思考 (琼·斯科特, 康宏锦译) ..... 66
8. 女性主义能为中国历史做些什么? (苏珊·曼, 蔡一平译) ..... 76
9. 东方主义时代前的中国妇女史 (苏珊·曼, 李国彤译) ..... 79
10. 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 (杜芳琴 蔡一平) ..... 84
11. 经验的证据 (琼·斯科特, 蔡一平译) ..... 93
12. 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女权主义历史——对话语和经验的历史化  
(凯瑟琳·肯宁, 王向贤译) ..... 102
13. 如何面对连续性: 从西欧妇女经济地位谈起 (朱迪思·贝内特, 杨松涛译) ..... 112
14. 理论与材料——西方明清史研究的新走向 (李国彤) ..... 121
15. 依违於私情与公义之间——孟姜女故事流转探析 (刘静贞) ..... 128
16. 在儒家视野之下——中国历史上有关性别的作品 (苏珊·曼 程玉瑛) ..... 139
17. 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 《生死场》的启示 (刘禾) ..... 142
18. 妇女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妇女口述史 (希尔娜·格拉克, 张玉平译) ..... 150
19. 汉代妇女之灾异论 (刘咏聪) ..... 156
20. 依违于妇德与才性之间: 世说新语·贤媛篇的女性风貌 (梅家玲) ..... 170
21. “空间”与“家”: 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与空间 (高彦颐) ..... 181
22. 变得可见: 欧洲妇女史·导言 (Bridenthal/Koona/Stuard, 蔡一平摘译) ..... 197
23. 社会性别: 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 (琼·斯科特, 刘梦译) ..... 203
24. 女性主义与历史 (琼·斯科特, 鲍晓兰译) ..... 216

# 妇女史的挑战

[美] 吉达·勒纳 著

(译自吉达·勒纳(Gender Lerna)《多数群体寻找她们的过去》第12章“妇女史的挑战”。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1年。译文发表于《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4期。)

历史上有女人,也有男人,人们都希望在撰写一定阶段的历史过程时既涉及到男人也涉及到女人的活动与思想,果真如此,那就确实不需要妇女史了。然而事实上,由历史学家们按传统方法记载和解释的历史是以男性价值观规定的男人们活动的历史——恰当地说,是“男人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妇女很少被提及。在非常偶然和特殊的情况下,少数几个妇女被注意到,但她们几乎都是那些重要的男性人物的家庭成员或亲属,通常扮演着为男人服务的角色。面对这种极度被忽视的局面,重建女性历史的努力便被称为“妇女史”。不能将这个术语仅仅理解为对过去史实的描述,妇女史是集中力量剥离出被传统史学掩蔽的部分。

1 妇女史对传统史学的第一个挑战是断言妇女有自己的历史。由于父权价值充斥我们的文化和观念,妇女史已被模糊与误解。当然,这种价值观在我们的文化中被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所接受,以致习焉不察。

什么是父权价值观念?简单地说,就是这么一种假设:上帝造就的男女两性生理上的不同,或至少是一种由性别造成的人类活动的“自然”美异,进而又假定了由此导致的男性对女性的“天然”统治权。但是,妇女是人类的一半,有时是一多半,常识性的观察和推理告诉我们:全世界工作的一半、经验的一半是属于妇女的。然而,在历史学家撰述的有文字以来的历史中,妇女只是作为人类发展中的一种陪衬的“贡献者”而出现的。它假设“男人是衡量重大事件价值的尺度”,于是男人的活动被看作天生地比女人的活动更加重要,例如:战争与政治,在人类历史中就被看作比女人养育孩子更加重要——因而,我们发现在历史中,关于妇女的记载是如此之少,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发现妇女历史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父权的假设,并且要超越这种假设。一旦我们破除了妇女被包容在男性体系之中的这种假设,我们就开始将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而不是人类中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考虑了。与男人一样,妇女必须要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怎样去发掘这个历史呢?关于妇女的过去我们将提出哪些问题呢?历史对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妇女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在一些特殊事件——诸如战争、革命、萧条中,两者的经历有哪些不同,或者说完会不同,对男人来说,重要的转折时期是什么,对女人来说,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将引发关于妇女历史的信息。

2 任何人企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立刻面临着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妇女?怎样将其概念化?因为在传统地考察决定文明进程的领域中,显然看不出妇女的决定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妇女归于这种或那种少数群体的分类是不太合适的。虽然研究妇女史的历史学家们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意见,还是让我先下个结论吧:从任何意义上讲,妇女都不是一个少数群体。妇女是一个性别整体。作为少数群体的成员,她们在教育、法律和经济各方面受到歧视,但她并不像那些真正的边缘群体,分散于社会中的各个集团和阶级之中。种植园的女主人和女奴隶,工厂主的妻子与工厂女工,都属于妇女史的部分。妇女与她们同一集团的男人的紧密关系要超过她们与其他阶级、种族妇女的联系。最后,妇女总是用其自身被灌输的服从的价值观来教育她们的男孩和女孩。毫无疑问,妇女为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她们必须作为参与创造历史的羽翼已丰的成员来对待。

由于妇女的数量及其在社会中的分散状态,也由于她们与男人有着紧密的和重要的联系,妇女对男人的依附将继续下去,至少一直到妇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合作与团结之时。因此,这种依附关系与人类其他的依附关系相比,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应该怎样描述和理解它呢?或许从下列的

事实考虑是有益的：在整个历史中，男人和女人都曾为将自身从生理的需要中解放出来而奋斗——摆脱饥饿、寒冷、为有限的生活资源而竞争——积累足够的剩余资料来维持群体的生存。在大部分历史时代，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中。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获得不得不放慢速度，这首先是作为概念及现实的可能性被提出，其次是价值观如法律一样制度化。对于人类的大多数来说，要获得这些权利只有通过一次次地斗争来克服阻力。只是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在广泛存在着经济保障的条件下，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要求才作为人权而兴起。因而，在整个前工业社会，不论妇女经历了怎样的依附地位，都必须在她们所在群体中男性也被压抑的范围中加以描绘和分析。

然而，不论是作为被压迫的下层阶级的一员，还是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分子，一个妇女的地位总是和她所在群体中的男性有着根本区别。正确地理解并充分地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期两性关系的变化，是妇女史的主要课题之一。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妇女不是通过生殖的性别功能，也就是说，通过社会需要一个成年妇女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去完成生育子女的任务而受到压迫，而是通过男人建立的社会对这种活动进行的贬低而受压迫。妇女还通过性奴役而受到压迫，显而易见的诸如，胜利者对被征服群体中妇女的强奸；主人对依附阶级妇女的强奸；千百年来有组织的卖淫；对单个妇女结婚并将家庭服务作为她们的主要职业经久不变的压力。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受压迫，是通过否定她们与男人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最后，在比任何其他群体都长的时间里，被否定具有政治参与和管理政府的权利而实现的。

3 妇女史的第三个挑战是：需要在传统史学增加新的问题，以便引出关于妇女的信息。必须将性别作为历史的一个分析种类。在分析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事件时，当用性别来考察种族、阶级和宗教成员时，在社会史研究中就会增加一个全新的领域。妇女如何受到家庭生活、就业机会、教育、法律及制度结构变化的影响？她们变化的地位如何影响社会价值观念？诸如此类的问题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妇女的信息，并为传统史学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野。

4 妇女史的第四个挑战是对传统史料的挑战。

传统史学家对他们在历史学中忽视妇女的辩解顶多是史料的缺乏，这早已站不住脚了。事实上，由于特殊的从属性质，大多数妇女在历史上是默默无闻的。人口统计史的一般资料——户口调查的数字、教区和出生记录、财产和税收的记录、遗嘱，这些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过去那些无名的男女生活圈子、孩子出生率、婚姻行为方式、经济活动等方面的重要材料。寻找妇女活动的其他有用资料来源是教堂和教育机构的记录、一些组织的记录、警方和犯罪的记录、医疗机构的记录等等。对日记、家信、自传和方志等材料不断增长的兴趣使历史学充满了生机。实际上，有关妇女历史材料并不缺乏。

然而，当历史学家们着手再历史时，他们对这些材料也面临着显而易见和实实在在的困难。其中之一便是这些历史材料大部分是由男人记录和收集的，图书馆和档案材料也是按男性中心历史的传统分类整理的。没有多少材料列入“妇女”类，有关妇女的材料通常被列入“男性”的分类。因而，要阅读关于妇女工会活动的材料，便要煞费苦心地从编入工会组织记录的卷册中重新整理。妇女的工作通常不被单独分类。不论妇女从属于什么样的“男性”组织（一般是男人与女人共同建立的），通常都没有记载。例如，女性反蓄奴的社团组织的工作就很少受到关注，除非当它与“重要的”组织产生冲突。这样，妇女们要么成了一种点缀，要么声名狼籍。

由于已婚妇女使用她们丈夫的姓名，她们就成为男系家庭成员，并很容易被消融在这种家庭。发现者指南、图书目录及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手稿目录集》也都带来并加重使妇女“失踪”的趋势。手稿的注释及索引对历史研究的选题和主要选材产生很大影响。历史人物的重要文献已被保留、注释、索引，使学者们可资利用，但这些文献通常是由社会资助的大型系列的课题，其父权思想的偏见一以贯之，并将妇女弃之于历史领域之外。这种态度正逐渐浸染着新一代学者。一些补救措施正在实施中，但在历史研究建立起基础之前，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清除这种对妇女的无知偏见。

最重要的补救措施之一是对妇女史料的调查。由国家资助的人文科学基金项目现已快完成，第一阶段是在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这个调查试图为美国妇女史研究确定和汇集一部原始资料的指南。该指南将记述 3,500 种资料，重点收集那些鲜为人知和很少被使用的材料，为这一汇编所进行的必要的研究，促使大批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努力发掘，并且引起对已掌握的档案的重新分类，以便使妇女史的资料更为明显。这个研究项目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工作，它已证明了迄今为止未接触过的丰富史料的存在，它终将有益于整个历史研究。

如前所述，妇女史不止是找出妇女史料，并将其填入父权制历史的空白之处，而是以其新的优势、新的姿态、新的方法对传统材料提出新问题。男性中心的偏见不仅渗透于解释者的头脑，而且也渗透到史料之中。我们从传统史料了解到妇女的大部分材料是通过男人观察的透镜中折射出来的，妇女史学家必须对这种男性中心的偏见提出质疑，并且要用体现女性观点的原始材料来反驳这种偏见。

当然，我们不可能总是找到这种史料，历史学家渴望避免这种限制，他们喜欢使用大量的权威性的有价值的的数据材料，然而甚至这些数据也是用限定的男性中心价值体系来解释的。下面一例即是证明。最近，男性人口史学家解释欧洲 18 世纪和美国 19 世纪出生率的下降，证明了那时妇女“家庭权力”的增长，因为她们会通过抑制性要求来影响她们的丈夫，这就意味着控制生育。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对这种说法提出疑问，并且指出，没有任何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这些卧室的决定是如何产生的。这恰恰可能是出自男人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在工业社会男人是活跃的，并且直接看到子女教育对于地位升迁是如何重要，可推论出限制孩子的数量以便使其受到更好的教育。

#### 5 妇女史对传统历史分期的挑战

在传统史学中，以战争、征服、革命或巨大的变化、宗教变迁来分期，所有这些分类都与男人的主要活动相适应，特别是参与政治活动的男性。研究妇女史的史学家们已经了解到，这样的分期是对妇女史的曲解。

那些提高男人社会地位——有助于他们获得经济上的机会、获得解放和社会名望的事件，在妇女身上常常呈现适得其反的影响。因而，最近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男人获得了发展自己的机会与知识；而妇女却经历了比前几个世纪更多的束缚与限制。事实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妇女占据了一些通常留给男人的位置，但这并不能驳倒上述结论。在美国，杰克逊时代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政治经济变革对妇女的影响也是如此。男人受教育和地位升迁的机会与将妇女从这种机会中排除出去是成正比的。医学与法律的专业化对妇女的影响，是将她们排除于这些职业生活之外达一个世纪之久。大部分白种男人赢得了政治权利，迄今为止，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要受到财产的限制，结果只能是在社会中加深了男人与妇女机会不平等的鸿沟。妇女至今仍被排除在外，这不仅是由于原有的习惯，而且来自于选举所循的法律制度，中产阶级妇女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这也是女权运动的主要动机之一。同样，在 15—16 世纪的欧洲、18 世纪后期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使大量男人从经济赤贫和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可以考虑自由、机会、地位升迁等诸如此类的属于权利的问题。对妇女来说，此时还不能实现这种发展，因为她们还没有从生物性需要的生育中解脱出来，为了保证一定数量的孩子能存活下来，她们必须尽力而为地生育孩子。决定妇女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医学知识的推进和社会服务的普及，诸如卫生设施的改善，从而降低婴儿死亡率，减少儿童生病与死亡比例。现代化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这些前提条件，但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妇女受益不同。如欧洲中产阶级妇女在 18 世纪，美国白人妇女在 19 世纪，下层阶级和黑人妇女在 20 世纪。这种妇女解放前提条件的变化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低婴儿死亡率和低生育率没有呈现出平行的曲线。在美国，生育率在整个 19 世纪都在下降，白人妇女的生育率 1800 年为 7.04，1850 年降至 5.24，1900 年又降到 3.56。黑人妇女生育率下降更快，但那是从 1880 年才开始的。白人及黑人妇女的婴儿死亡率晚些时候都下降了，但不那么富有戏剧性。由于 19 世纪全国出生统计不完全，这些数据都是粗略估计的。根据权威估计，1800 年白人婴儿能够活到两岁半的占 78%；1901 年占 84%；1950 年占 97%。

这些数字表明，白人婴儿的死亡率在 20 世纪发生了最惊人的变化，同时出生率的降低在 19 世纪上半叶最为显著。黑人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则要晚些，大致在 1940—1970 年之间。

在“人口统计数字转化”时期，低死亡率使家庭生育计划从需要大量生育的状况中摆脱出来，不需要引导出生率的降低。尽管美国的情况是如此，但引起出生率降低的原因是复杂的，历史学家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妇女在家庭生育计划决策中的角色存在着争论，指出这一点并不必用简单的理由解释，而是要表明，妇女做决定所要依靠的真正潜力来自于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和受教育，只有这些条件具备以后，妇女才能在除去再生产职能之外，追求她们的自我实现和地位升迁。历史学家林达·戈顿(Linde Gordon)已详细地说明了，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妇女一直可获得一些技术手段来控制生育，尽管这些手段经常是残忍和危险的(例如溺婴和堕胎)。她指出：“渴望安全的流产和避孕及由此带来的问题使妇女产生了共同的女性经验……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她们甘冒巨大的风险，来赢得一小块空间支配自己的生活。”然而，从整体来看，妇女影响出生率的能力要依照社会态度和需要的变化。当这种转折产生时，对妇女来说则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它们超过男人的“文艺复兴”的不同之处是其产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这种“文艺复兴”阶段之后，向妇女灌输母道是生命主要价值的宣传才变成强制性的父权文化神话。

## 6 重新界定分类和价值的必要性。

把妇女史形成过程看作是对“失落的史实和观点”的汇集，然后将其填入传统史学的空白之处，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太狭窄了，甚至是一种谬误。在过去 8 年中，所有严肃地涉足到这一研究领域的人都清楚地感到，我们需要重新界定历史的分类和历史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妇女史的第六个挑战，并且这也是最基本的挑战。

妇女被排斥在历史之外，并不是由于一般男性民众或男性史学家的罪恶阴谋，而是因为以往我们在男性中心的范围内思考历史。我们之所以失去了妇女及其活动的历史，是因为我们提出的有关历史的问题不适宜于妇女。我们必须修正这一点，为历史的黑暗处带来光明，在一段时间里，将注意力集中在以妇女为中心的调查上，在男女两性共享的一般性文化中来考察女性文化存在的可能性。历史必须包括女性的经验，并且也应该将女性意识的发展过程作为妇女史的基本方面包容进来。问题随之产生：如果通过妇女的眼睛来观察，并通过女性的价值观来规范，历史将是什么样子？

如果历史学家采纳了这种态度，哪怕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历史进程中的黑暗之处和妇女的历史经历就可明朗化了。它们包括：不同的生活圈子、不同的历史转折点、不同的期望、不同的机会、甚至对自身及他人的意识也不同。在工作中，妇女经历的历史与男人相比更不一样。有史以来，妇女一直从事着两种工作——付钱的工作和不付钱的家务。在商品经济中，妇女的工作以附属性、临时性和地位低下为特征。结果，大多数妇女从事低薪工作，总是最后被雇用，最先被解雇，工资待遇也总是不同，这些均不利于劳动妇女的发展。妇女所从事的另一类工作——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倒是一直被社会承认是她们的主要职责但至今仍是不付酬和不为历史所记载的。

但是，养育孩子是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没有它，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家庭妇女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不可缺少的服务性工作，才使得男人有可能去从事有薪水的工作。在男性价值体系中，我们只把那些有酬的工作叫工作，因此，就将绝大多数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忽视了。为什么从来没有一部关于家务劳动的历史呢？为什么我们只是在近两年里才从事养孩子的历史研究？只有女性中心的方法才能接触到这些问题。

妇女还通过社区建设来影响历史。当男人们从事征服和建立统治制度并藉此控制和分配权力时，妇女则在对年青一代传播文化、建立社会网络和基础结构以保证社会的延续。

一个典型的模式可能是这样的：妇女察觉到社会或社区的需要，开始用实用的、非制度化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然后逐步扩大她们的影响，建立起一个小型机构，并靠她们义务活动积蓄的资金来支撑它。于是，在一个又一个社区里，妇女们建立了孤儿院，收养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还建立了养老院、幼儿院、图书馆。通常，当这些机构在建立和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就被注册，领取执照，变为社区的一个机构，并且往往由男性组成管委会来接管。随即，它也就被载入史

册，这种官方的位置使其有资格被记录到历史资料中去。早已从事这些工作的妇女，如果能在记录中露面，也只是作为辅助性的妇女团体，或不能报酬、不记姓名的志愿者出现。以女性为中心的研究便要揭示出这一个个社区中隐蔽的历史，引导我们以新的和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社会的历史。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鸿篇巨制的记录可资利用，但现在基础的研究和统计工作还没有做。现在可能比较明确了，妇女史不是一种“奇特的新产品”，也不是流行一时的政治鼓动性的“狂热”作品。它将不会转移目标，也不会消失。

#### 7 妇女史要求模式的更新

妇女史要求对传统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假说和方法论进行基本的再评估。

文明是基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由全体男人和女人的活动组成的。劳动分工和两性关系的变化本身就是历史现象，必须要按其本来面目来记述。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全面的历史，它将是传统史学与妇女史的综合体，它将建立在已有的历史分期的比较之上，将男人的历史经历与妇女相比较，其中，男人与女人的交互作用的研究与他们之间区别与冲突的研究是一样重要的。只有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细节研究之后，当这些概念已经进入了一般文化之中，我们才有希望找到通向新的全面历史的途径。但这已经足以证明：只有建立在妇女已被承认为历史的基本创造者，而且将男人和女人同样作为衡量历史重要意义的尺度的基础上的历史，才能成为真正全面的历史。

(蔡一平译，闵冬潮 校)



# 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

## 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

吉斯拉·鲍克(Gisela Bock) 著

载于 Gender & History, Vol. 1 No. 1 Spring 1989

许多年前，“妇女有没有历史”这个问题还远不是一个需要言辞来讨论的问题。传统的历史编纂不仅出于无意，而且有时是系统地排除在“普遍的”或“总体的”历史之外。同时，由于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妇女史、女性史学家虽然有限却在不断扩大的影响，这一问题部分地得到了回答。在美国、瑞士、意大利、瑞典和丹麦，一些重要的史学杂志甚至进行了双重冒险：为妇女史和新一代女性史学家出版专号。我们发现，妇女史并不仅仅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才出现的，女性史学家有着研究妇女历史的长期传统，随着史学专业建立，这一传统或者湮灭了，或者被纳入其中。对妇女史的研究促使人们深思：这种历史可能会是什么？在编纂历史之外，它还有什么含义？它与男人和女人都平等地占有一席之地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将妇女添加到历史中”的追求不久就变成了“用妇女来修正历史”的追求。妇女和女性经验有一个历史，这个历史虽然不是独立于男人的历史，但它仍是自己的历史，是妇女作为妇女的历史。为了探究它，有关历史上的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这些等级划分就得推翻。妇女们做了些什么？应该做什么？想做些什么？这些都被详加考察和重新评价。尽管有大量各异的、有时是引起争议的研究结果，Maite Albistur 最近还是指出了两点共识：“毫无疑问，描述妇女的历史，其复杂性毫不亚于男性。但是，我们可以用那无法根据同样的节奏来传递、男人无法用同样的方式来感受的人性中的女性部分来设想生活的那个时代。”妇女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男性的历史是同样的，它不是线性的、有逻辑的或者内聚的。另一方面，它不同于男性的历史，正是由于这一差异才使它值得研究——这种不同不仅包括了历史经历的内容，而且还有时代本身。

妇女史独有的特点，也就是它不同于男性历史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相比之下较不重要或者只是“特殊的”“专门针对女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普遍的历史直到今天基本上都是专门关于男性的；另一方面，妇女的历史必须当作是“另一个”性别的普遍的历史。不仅如此，妇女史与男性历史有区别并不意味着妇女的历史对所有妇女来说就都一样了：妇女并不全都有着同一部历史。通过对妇女之间的差异、区别、不平等进行历史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女性和男性历史之间的差异、区别、不平等大有裨益。正出于此，一本意大利的妇女史杂志《Memoria》出版了一期，主题为“小的差异和大的差异”。

女性经验和地位的多样性已经被揭示，在别的方面，妇女史实际上要处理社会的所有领域：那些只有妇女出现的领域（例如妇女组织、妇女文化、现代的家务劳动），那些妇女构成了其大多数的领域（如迫害巫师和贫困救济的对象），那些妇女作为与男人同等的成员而存在的领域（家庭、性关系、阶级、少数民族），那些妇女对于男性来说构成了少数群体的领域（如工厂工作、历史的编纂），还有那些妇女集体缺席的领域（如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发生的“普遍的”选举权运动）。换句话说，妇女的历史不仅要被理解为复数而不是单数，而且它的多样性存在于整个女性性别的复杂历史情境中。

妇女史使用了历史学家所能使用的所有方法和手段，包括人物传记，文化的、人类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历史，意识和观念史，口述史，还有社会史的方法，如人口流动的研究、人口统计学和家庭史。实际上，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的独创性并不在于它的方法，而是它所提出的问题 and 它的视角。在历史学中，提出什么问题，采用什么视角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基于预先思考、有意识或无意识、政治或理论判断而有所选择；正是参考了它们，材料才开始向我们说话。

妇女史经常受到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女权主义经验和思想的影响。这种动机是妇女史启蒙的一个

来源，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它有时也是个缺点，换句话说，把今天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简单地放回到过去，就显得不合时宜。正像一个历史学家所警告的，当我们只是把过去看成是现在的一种功能、一种工具，那么我们就可能染上许多历史学家的职业恶习，因而妨碍了“与历史上的妇女展开真正的对话”。

为了保持这种组织上和方法上的多样性，让我们举例说明在强调妇女史与男性史之间差异的同时，也强调妇女之间差异的意义。在现代意大利的早期，特别是在16和17世纪，在经济危机、瘟疫和城市人口过剩的刺激下出现了救济穷人的新形式，城市里严格禁止行乞，建立了将穷人下狱的新制度。在传统的历史编纂中，这被看成是“伟大的监禁”（福柯），它为资本主义的上升提供了基础，制造了所需的男性劳动力，恐吓那些拒绝工作或被认为拒绝工作的人，将之贴上活该受穷的标签。然而进一步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被关押的人当中大多数是妇女，她们传统上就被认为是一些该受穷的人。实际上，这些制度更重要的部分很快就专门用来对付妇女了，像佛罗伦萨的Ospedale dei Men dicanti。鉴于男人贫穷，特别是男人乞讨，被认为是拒绝做工，而女人贫穷和乞讨被定义为“女性名誉”的严重丧失。这一女性名誉被看成是性的完贞，是一种也可以用于所有其他妇女身上的社会标准。

在城市中建立了一种更专门的类似修道院机构的网络，“不合规矩的”女人——被殴打、遭遗弃和不服管教的妻子，通奸的女人，从前当过妓女的，寡妇，老太太，孤女和穷人家的女儿——在那里寻求庇护或者被迫呆上长短不等的一段时间。通常情况下，特别是对年轻妇女，这些机构只接收漂亮的，因为残疾、有病或丑陋的妇女，她们的性名誉似乎不必担心。1674年的一位作者写道：“那些除了她们的美貌以外没有其他嫁妆和生活来源的贫家女孩”，不该非得“只是为了一天的生计，就以可怜的价格出卖她们仅有的资本——她们的贞操”。这些机构的任务就是保护或者恢复女性的名誉——因而冠之以 conservatori——替代家庭担当起名誉保护者的角色，帮助她们找到回归正常生活的办法：攒一笔结婚的嫁妆，进入修道院，或者帮助找到一份做家庭仆人的工作。1632年在佛罗伦萨，全部贫困救济机构里四分之三住的是妇女，占到女性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因此，关于贫困和救济，女性的经历不同于男性；它也不是所有妇女的经历，而是一少部分。然而，这一少部分女性群体的经历是与女性性别作为一个整体的想象和现实连在一起的。

##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历史的范畴

研究妇女史，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将妇女作为人类的一半来考察，在一些国家和某些时代甚至超过了一半；实际上，一本很有影响的重要著作就是冠以这样的题目：《多数群体寻找她们的过去》。用概念化的术语来说，这种考察意味着以下原则：将妇女史从一般历史中分离开，并不比将男人的历史——甚至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历史——从妇女史中分离开遇到的问题少。妇女史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类的一半，而是全部。

将这一半的历史与那一半的历史联系起来，并且两者都与通史相联系，其最重要的步骤是将妇女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群体，即作为一个性别加以概念化。于是男性也作为有性的人显现出来，这样新视角就转向不只关于妇女和妇女问题而是关于所有的历史问题。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性别(gender Geschlecht genere genre geschlecht)作为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事实、认识和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被引入，在一些语言中它从一个语法概念变成了一个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含义的概念，虽然这个新的专门术语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语义和文化涵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引入“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并迅速传播取代了“性”（至少在英语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不能将“妇女问题”、妇女历史和妇女研究降低到只是在性的意义上与性别相关，而是必须包括那个社会的全部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意味着通史也必须被看作是两性的历史：看作社会性别史。

同样，对许多人来说研究社会性别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社会性别或者生理性别不再被看成

是不言自明的：它们既不是显而易见的，也不是先天就有的。现在很清楚，既然那些基于社会性别概念、基本假设和历史研究的结果还不是历史理论词汇表的一部分，那么就on必须重新创造、发明和研究它们。例如，在多卷本的重要著作《基本的历史概念》中，社会性别（Geschlecht）这个词条并不是和其他的概念像“工作”、“种族”或者“革命”并列出现的，“妇女”也不是，当然还有“男人”。虽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对于两性进行哲学思考，但是《哲学历史辞典》中还是没有出现社会性别，而在“性”（sexuality）这个词条下，我们可以发现细胞淋巴、基因和荷尔蒙。

但是社会性别史拒绝这些方法：在似乎看起来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上忽略和缩减社会性别。我们认识到，一方面所有已知的社会都有基于社会性别的领域、行为、活动，在社会性别基础上的差异无处不在；另一方面，社会性别差异的具体表现在每个社会是不一样的，它们不是普遍的，女性地位的变化就像男性地位的变化一样复杂多样。其次，我们要学会将基于社会性别的差异问题从基于社会性别的等级制度——即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问题中分开。差异和等级关系并不总是有必要联系在一起，也不是同一的：例如，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必然表示社会报酬和权力的性别区分。第三，很明显，男女学者的认识，其中大多是西欧和北美的学者，受到他们自身所在的文化中社会性别关系的深刻影响，受到流传深广的种族的和欧洲中心文化的影响，在妇女地位和妇女解放问题上充满了各种歧异的假设。现在对性别的理解和用来描述它们的术语是历史上，特别是自18世纪以来文化和科学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是性别关系自身发展的产物。所以，两性和两性关系必须要作为社会、政治和文化存在来看待。它们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历史之外的因素，只是单一的、简单的、一成不变的，是原始或固有的原因和起源。

在这种情境下，当我们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范畴”来谈的话，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知识结构，一种思考和研究的方法，一种能帮助我们发现历史中被忽视的领域的分析工具。它是一种挑战传统史学性别盲点的社会文化反思的概念形式。重要的是要强调，社会性别范畴必须作为特定情境的，依赖情境的。它为更深入地理解各种历史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它不应该被用作一种静止的模式、解释历史事件的全貌的产生原因的一个神话。它的力量不是简化——将历史简化为一种模式——而是启发，作为一种揭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变异性的一种方法。社会性别是一个“范畴”，不是在普遍陈述的意义上，而是如这个词的希腊语起源所暗示的那样，是在公开的异议和辩论的意义上，是在争论、反对、加工和处理的意义上。

这一公开的异议首先发生在对“生物学”范畴的认识上，它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归纳简化的典型，因此成为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障碍。为了严肃认真地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社会文化范畴，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扫除“生物学”的社会文化概念，放弃与之相联的观念。用研究妇女社会文化的历史学家通用的语言来说就是：这种研究与生物学这个词无关。要对那些曾经利用过“生物学”的历史人物和时期（例如，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加以精确地批判研究，应该分析、解读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个词。

概念化地说，必须认识到在一般历史记录中的“生物学”，通常不是真的指——像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那样——那些非社会的、前社会的，甚至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对象，相反，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文化概念，记录和歪曲着不同性别之间、其他群体之间的认识和关系。生物学（biology）一词是19世纪早期由德国和法国的男性学者发明的，后来又获得了许多不同的意义，一些意义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在世纪之交，特别是通过那个时代关于“自然 vs. 教养”的争论得到了流行和广泛使用，开始是在德语和英语世界，后来是拉丁语系。以前，生物学并不存在，用来描述女性性别的术语是不同的一种词汇和语境，而不是后来的与社会性别相联系的生物学。20世纪，“生物学”一词成为了左派和右派的共同语言的一部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妇女运动中并不用这个词，通常用文化的术语来表达对社会性别的想象，包括关于母职的观念。

今天，生物学一词有了丰富的意义，历史学家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明晰。它可能意味着自然科学，特别是决定于基因，而这根本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领域。它也意味着某种科学的对象，从生命和死亡到解剖和身体、到基因和大脑，从植物和生物食品到动物和人类。今天，

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生物学的母亲指的是基因的意义上的，还是怀孕的母亲？生物学可能指的是关于人类及其它生物存在与活动的一种思考方式，从生理决定论到生理上的变化。自从生物学一词被普遍使用以来，特别是在最近的意义上，它指的是存在于社会文化现象后面的一种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恒量。也许在更通常的意义上，它也意味着通过“生物学的”，就是说对身体的干涉而产生社会变化的一种视角。

“生物学”观念的社会文化特性在许多层面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它明显地带有社会性别偏见，因为它不时地被用来谈论女性性别而不是男性性别。例如，在生物学概念产生很久以前，Jean-Jacques Rousseau 阐述了相同的观点，但用了文化的术语：“男人只在一定的时候才是男性，女性在她的一生中都是女性”（他谨慎地加上了一个小小的但很说明问题的保留：“……或者至少在她年轻的时候”）。生物学是古老假设的现代隐喻，男人是非社会性别化的，女人是社会性别化的生物，男人是“一种”性别，女人是“另一种”性别，更有甚者，像十九世纪所说的，女人才是“性别”。

最重要的，这种假设暗示着一种价值判断。生物学可以负载着许多希望和恐惧，可以被看作一个障碍和一种资源；它有着不断变化但却非常具体的内容。从政治和历史上看最有权威的内容，是它带有一种关于人类价值的消极判断；这里，生物学是对缺少价值、等而下之的一种隐喻。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用在那些妇女生活和活动的领域，这些领域比男人的低下，如生孩子、抚养孩子和通常不算作工作的家务劳动，即便“生育工作”在传统的德国妇产科中是一个常用术语，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语中，工作（labour, travail, travaglio）也指生育。

生物学这一术语的使用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人们之间身体上的不同说明了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是正当的，平等只应该在那些身体上平等的人们之间实现。生物学的问题被证明是一种两性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许多妇女只能通过她们丈夫的收入来获得她们社会贡献（照顾孩子、做家务和社区工作）的报酬，这种特殊的安排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实际上，都不是出于妇女是比男人更好的家长这个事实（如果它确是事实的话）的要求”。并不是解剖学给那些妇女带来了较低的报酬，而是以生物学为形式、生物学的价值判断的文化造成的。生物学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这一点可以从生物学的术语最初不仅与妇女相关，而且也和被排除在社群之外的其他社会现象相关这一事实中看出来：例如，精神错乱、智力低下的问题，疾病，生与死的问题，（基因或其他方面的）遗传病，身体和化身的问题，少数民族和种族的问题。可以说，生物学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作为一个社会文化范畴和社会干预视角的出现延伸到了所有的那些现象，超越了传统的“社会问题”和传统的社会科学和政策所掌握的那些问题。在这种情境中，生物学的种族主义观念对于性别歧视的解释特别富有启发，无论是发展它，还是重复它。

不消说，黑人在所有方面都是不能与白人自然平等的，但在一个方面是不同的。不消说，妇女在所有方面都是与男人天然不平等的，但是进一步说，在四个或五个方面是不同的。但是，部分的和身体上的不同，既不是白人和“异类的”种族或一个和“另一个”性别之间关系的原因，也不是解释。“生物学本身是无声的”。性别歧视主义和种族主义不是从身体差异中产生的，而是特定的身体差异被用作论证以前不存在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合法性。所谓生物学的差异成了现实中或所谓的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隐喻。现代的种族主义和现代的性别歧视都将“异类的”或“另外的”群体归为下等，不仅否认这种群体的平等权利，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否认它们具有不受惩罚表现出差异的权利。换言之，它们要将那些实际上或所谓的——在身体、思想、感情，即文化方面——过着、必须过着、想要过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们，从接受了已设的文化规范和价值标准的人群中区别开来。

近来历史学家和（社会）生物学者做了很多努力去研究历史上的生物学，当然是重新发现它的守旧和反动的一面。在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中，在确定女性身体及其周围的活动时，生物学也是常用的。最常见的，这种生物学仅仅指母性，像取消女性的生物学意义的想法，特别是涉及到试管婴儿一类问题上，希望以此来达到一种两性之间的假定的平等。历史学家也使用这个语言和概念，

像有人主张妇女解放的主要障碍就是她们的“致命的生物学”，男人正是以此建立了统治地位，女人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她们自己从生物学中解放出来。然而，这种价值和观念是有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女性的“生物学”实际上可能很快就轻易地进入了现代生物科学的各方面。人们可能回想起 Hannah Arendt 在 1972 年就这种解放或平等所发表的评论：“真正要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失去了什么？”

然而，对于思考历史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把这种观念和价值观投射到过去的时候，我们无法对历史上妇女的实际经历作出公正判断。例如，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 20 万妇女做了绝育，毫无疑问，她们免去了“致命的生物学”，并把这当成一种解放。她们的例子，还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其他受害者的例子，清楚地证明了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生物学是一种通过生物学的手段、通过干预身体和生命达到社会变革的观点。更有甚者，实际上几千名妇女死于强迫的节育并不是女性的生物学原因造成的，而是纳粹种族主义的男性代理人和受害者之间权力关系的结果，受害人之中有一半是妇女。如果说在这些例子中，历史学家不应把不育和死亡归于生物学，那么在另一些例子中，也不应把生孩子归于生物学，而应归结于社会性别关系。

由于女性主义者和反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形象表现的含义，特别是母性的含义不断简化，“生物学”或“生物学的性别”更让人迷惑了，因为它模糊了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试图揭示的东西：女人和男人的身体的经验、活动和描述，其构成方式、多个侧面和不断变化的形式，当然，它与其他各种方面的经验、活动和描述是密不可分的。

同样，这种颇有问题的简化在二分法中得以发展和理论化了，在“原始的生物的性别向社会性别转化”的假设中，还有其后发生的“什么因素、多大程度上应该归于前者或后者”的争论中，提出了“（生物学的）性别”和“（社会的）性别”。生物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别没有解决问题，只是重复了对于两性之间“自然 vs. 教养”的争论，一种更广泛的对立。这是一个矛盾的难题，因为假定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范畴，它同时就将生理性别简化成一个“生物学的”范畴，因而确认了社会性别的传统观点。常常基于理性发现二分法在经验和解析方面是错误的。社会性别的杰出理论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因为对生物决定论的回潮激起的政治上的担心，她们坚持认为社会性别不能取消。然而导致我们丧失重要的明智洞察力的政治动机可能并不能为妇女带来最好的政治结果。也许，应该认识到：社会文化条件比起那些称作生物学的条件来说更不容易很快改变。实际上，应该认识到：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二分法和生物决定论的回潮一样，都是根植于互相对立的假设——社会文化条件因时而变，而生物性是一成不变的。

在任何情况下，阻碍理论洞察力的政治动机都不是应有的历史眼光。至于用社会性别史视角去研究历史，看来用一种综合的方法使用社会性别而不是“生物学”更有裨益：不仅要去了解被文化构建的女人和男人的生活，而且要去了解这些生活以外的东西，或被认为是失落在这些生活以外的东西。只有那样，社会性别才能成为全部意义上的一个历史范畴。

至于那些看来挑战人类理性和历史理性的，在我们物质和身体世界内外发生影响的力量，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另一些词汇去描述，而不是直接从生物学的传统里套用。我们可以从那些严谨的历史研究中找到一些词汇，有时这些研究被认为是专门研究妇女生物学的（例如母性、生孩子、助产士、保姆、妓女的历史），还有一些研究论证女人（还有男人）的身体是由文化和历史塑造的。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并非生物学的领域，而是妇女和社会性别的历史。

## 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关系

社会性别或性别指的既不是一个对象，也不是变化着的许多对象；它们指的是一套复杂的关系和过程。为了将社会性别既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又作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个文化现实来理解，需要“把它放在各种关系中来思考”。对社会性别的这一看法对所有形式的历史和现实都有意义。

### 作为社会性别史的妇女史

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意味着研究历史上的妇女不仅是研究以前那些被忽视的课题，而且是以往被忽视的人类和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用人类学家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的话来说：“妇女必须按照关系来理解——与其它妇女的关系，与男人的关系——不只是差异和区别”。Rosaldo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经常被忽视的角度，通过研究女人和女人的关系将妇女的历史整合到通史中去。我们不仅必须研究“性别之间”的关系，而且必须研究每个“性别内部”的关系；不仅是女人对男人的关系和男人对女人的关系，而且还有女人之间和男人之间的关系。

男人之间的许多关系已经是历史记录的重点，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领域，还有亲属和朋友关系，但是很少将这些领域当作社会性别关系来研究，或研究它们对妇女的影响。另一方面，考察妇女之间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家庭妇女和女性仆人的关系，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母亲、保姆和助产士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者和贫困妇女之间的关系，女传教士和殖民地妇女的关系，在职业和政治领域中的妇女的关系，要考察她们之间既冲突又一致的关系。妇女之间的亲属关系、友谊和爱也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通常重点着眼于社会性别关系和它们对于男人的重要性。

坚持研究两性之间特别是妇女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 1980 年代显得更加至关重要，这时社会性别大为流行，发展了一种关于社会性别的中立话语来软化妇女史的挑战。但是，如果忘记了两性之间、性别内部社会、文化和历史关系的发现，正是妇女们对女人进行研究的结果，我们就会远离我们的目标：我们要用包含社会性别的方法去做通史，而不是用社会性别中立的方法。妇女史就是出色的社会性别史。

实际上正像近来英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 Lawrence Stone 所表现的那样，学者们还没有把社会性别史，特别是妇女史，看作两性之间的一种历史。作为家庭、性和婚姻领域的专家，他研究的领域中妇女占了他所考察的群体的一半，社会性别关系显然很重要。在他的文章“只有妇女”中，他把自己放到历史学家的神的位置，为妇女史的写作颁布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遵守的“十诫”——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令人惊讶的。第一条是：“除了与男人和孩子的关系外，你们不能写妇女。”作者正确地认识到新的方法主要用于研究关系和关系之间的历史，但是他没有看到妇女并不仅仅是由她们与男人的关系而决定的，妇女和其它妇女的关系与妇女和男人的关系一样重要，儿童并不是非社会性别的生物，男人的历史也应该包括他们与妇女的关系。

### 作为男性历史的社会性别史

检视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意味着考察从前用社会性别化的意识和“特定的男性”术语写下的“普遍历史”：男人作为男人的历史。关于社会性别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女性性别上，是关于“妇女问题”的。男人好象存在于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性别关系之外。妇女史总是与男性史相关的专断已经陈腐过时了，但迄今，将这句话反过来说却不一定是对的。

军事史和战争史就是一个例子。它们都是专门关于男性的——理所当然，西方世界（至少是欧洲）的战争基本上都是男性集团之间的直接冲突。然而，这很明确的专门关于男性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一领域提出的，例如它与男性气质的历史的联系。此外，战争对女性和性别关系有着许多重要意义。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在解放战争和内战中、在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中，被强烈地社会性别化和性化了的战争符号和语言，想一想在早期的现代战争中建立的妇女营，想一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妇女和平运动，或者想一想一次和二次大战时卖淫业出现的新形式。

过去几年中主要是由男性进行的“男性研究”日渐开展，它考察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和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一些作者检视了战争与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调后者不应被理解成是“生物学赋予的”。妇女研究所表明的那些东西现在被男性研究证实了：社会性别规范和社会性别

现实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是随历史而变化的。根据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看法，男性气质对 19 世纪的男人来说不仅意味着权力也意味着悲哀和苦难。父职也成为历史学家的兴趣所在。由男人来做的这些研究受到了当今男性参与女性的经验和工作（《怀孕的父亲：父亲如何享受和分享怀孕和生育的经验》）的号召的鼓舞，也受到了不仅与女性主义对妇女权利的要求一致也可能与之发生冲突的“为了男人的权利”的号召的鼓舞。虽然这些男性研究已经搞清了一些课题，还有大量的课题要做，特别是在历史领域。

还有些经常被当成“妇女史”问题的，就是说用那些有名的——当然是男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于妇女、性别、性和家庭的思考方式来说是“妇女史”问题的，实际上必须要看成是男性的历史。从讨论这些问题的不断变化的情境中就能看出它们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妇女的历史。即：这些记录实际上表达的是男人对于女人的看法、他们关于性别关系的印象，而且很少是描述性的，而是教条的和训诫的。对妇女的规范通常不仅与对男人的规范不同，而且也与妇女的生活现实不符。对于男人的社会性别思想的研究非常与众不同，它有助于认识不同的哲学家的思想、男性个体的思想中存在的许多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这种研究也特别提高了对历史方法问题的认识：许多世纪以来，由男性说和写的历史中，充斥了老调重弹的厌女的表述，是很成问题的。这经常由暴行和谴责导致成为一种迷恋。如果忽视了分析这种情形产生的历史情境和重要意义，忽略了分析它们在一个作者的完整作品中的作用，忽略了分析同时代的女性是如何评价它们的，那么就会冒着犯时代错误的风险。在思想史研究中，通常很少涉及女性哲学家，或其它妇女关于社会性别和其它关系的想法和判断，通常是从男性的思想中揭示重要的差异。这里人们可能仔细体味 Hannah Arendt 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出生率 (natality)”——由她们生来的美德，以一种新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原则和能力，超出了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情，还有她的人类大多数 (plurality) 的观点，她认为两性的大多数已经被象征化了。人们还可以品味一下 Carol Gilligan 关于妇女在道德判断上存在着“不同的声音”的见解。因而思想史也证明了，男人作为男人的历史，只有在与妇女史和妇女思想的关系中才能看清，就是说，要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才能看清。

### 社会性别史和社会史

如果我们将妇女和社会性别的历史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史，那么我们要考虑它与社会史的关系。如果说社会性别是一个社会范畴，性别是社会存在，所有的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史。但这个定义完全与 1960 年代出现的“新社会史”相冲突。它的典型课题是（社会）阶级，相应地，首先要用阶级分层的术语来看社会。历史一般被看成由阶级结构决定的社会的历史。从妇女的视角看，传统的社会史对“社会”的理解太狭隘了。“社会”的观念与以“阶级为基础的 (class-based)”或“阶级特性的 (class-specific)”（经常用“性别的和社会的”一类词来表达）观念时常等同，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其它社会关系——如种族之间的和性别之间的关系——是非社会性的、前社会性的或者甚至是“生物性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历史学家经常争论阶级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经常宣称阶级比社会性别更重要；正如一位著名的社会史学家所说：

“也许妇女之间确实存在某些相关的社会性的共性，毕竟一些时期它在妇女之间存在过。但是，要理解自我和实际生活、理解大多数妇女的经验和利益（尽管她们在社会化和被排斥的经验上是相似的），更重要的是非常具体地描述它的变化，从中我们可以探究阶级的真实情况。一个住在新建的 Bismarckian Reich 的首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贵族妇女，她与自己同年龄的兄弟之间的共性，比起与夏天在 Saxony 打短工、既不会读又不会写的赤贫的波兰寡妇之间的共性，难道不是更多吗？”

这一图景当然说明妇女之间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别，实际上它利用的特征并不是阶级差别。贵族小姐年轻，那个女工年老；小姐受过教育，工人不会读不会写；小姐未婚，工人守寡；小姐是德国

人，工人是波兰人；小姐住在城市，工人住在乡下。但是年龄、婚姻状况、民族地位、住在城市或农村不是划分阶级的标准，也不能说十九世纪晚期很大程度上人们都有文化。如果这种景象要试图证明比起贵族妇女，工人阶级妇女过得不好，也可以把它反过来说。对比一下：一位年轻的、心地单纯的德国城市家庭主妇高兴地嫁给了一个德国工人，这个工人因为同享受着社会保障的一个潦倒的波兰乡下贵族穷寡妇的亲属关系而有经济保障。如果这种景象并没有说明阶级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它仍然说明了另外的重要一点：一个性别之间的差异与一个阶级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

事实上，阶级和社会性别都不是指同质的群体，甚至缺乏结成一体的必要的相关性，但是阶级和社会性别都是依赖于特定情境的重要范畴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现实。因而，妇女史也要研究阶级，女工、工人妻子、中产阶级和贵族妇女的研究都很重要。这些研究课题旨在解决三个难题：第一，阶级的不同的概念化，对男性来说，主要的标准是他们与资本、生产、市场和就业的关系；对女性来说，是她们与家庭中的男人，特别是丈夫和父亲的关系。第二，阶级基于社会性别的不同的经验，在妇女方面，包括她们为家庭成员所做的工作。第三，不同阶级的妇女之间的关系，可能与不同阶级的男性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

至于在阶级方面基于社会性别的差异，Clarissa Graves Perceval 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她是英国古老的贵族家族的一支后裔，1845 年嫁给了著名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历史学家 Leopold Ranke。通过婚姻，他获得了她 2300 英镑的财产，他因此青史留名，不仅作为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而且作为最富有的人。20 年后，Ranke 也被授予贵族头衔。这一阶级问题也有它社会性别问题的一面。如果 Leopold 是女人 Clarissa 是男人，那么 Leopold 通过婚姻除了获得贵族头衔，就不会那么富有。一个男人可以将他的贵族地位赠与出身资产阶级的妻子，反之却不行。就是说，贵族妇女比起贵族男性在贵族地位上要低（例如，前面提到的柏林贵族妇女的兄弟）。

#### 社会性别关系和其他社会文化关系

将社会性别看作一种社会文化关系，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眼光去观察社会性别和许多其他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例如，在阶级之外，还有种族、年龄、性、文化、语言、自由、宗教、家庭、经济。就像“阶级 vs. 社会性别”的争论一样，在社会性别和其他概念中展开了一场竞争，于是，它不是寻求不同关系之间的互动，而是被看作更基本的、更真实的、更重要的。例如，在 Stone 的第七条戒律中说：“你们不能夸大历史上社会性别的重要性，提得比权力、地位、财富的重要性还高，即使所有妇女都经历了同样的生物学的命运”。

然而，那种认为性别中立的因素，比基于性别的因素（用 Stone 的话来说就是“生物学”因素）更有份量的主张，忽视了这一事实：有史以来这两种因素对男和女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比如，在权利和财富的问题上就很明显。拿权力问题来说，不仅是因为男人通常比女人具有更多的权力，而且他们还有着对女人的权力。表面看两性之间的权力是可以正式分开的，而妇女也有她们的权力形式，经常是非正式的权力——或者像法国历史学家们所说的——“权力”有许多种，参与男性的权力、与其它妇女相对应的权力、女人自我维护的权力。社会性别研究为使人们看到权力现象是千差万别的，将权力合法化的形式之一就是把它社会性别化。

在财富方面社会性别因素也异常清晰。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比男人的收入更少。就是说——至少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有三个方面：作为家庭工人和在家做工的人，她们没有收入；作为中产或更低阶级的挣工资者，她们比同阶级的男人收入更少；在较高收入的那部分人中，她们只占一小部分（例如现在西德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妇女只占 4%）。

因此，每个社会文化关系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甚至超越这种观念，认识到人类之间也许是性别中立的每一个观点也都是由社会性别关系的条件决定的；社会性别是所有其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用社会性别中立的眼光看，宗教的历史，从古代的神到那些 20 世纪的神，是不可理解的。少数民族问题也是如此，特别在美国，有许多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别的研究；更近一些的，在德国开展了对受种族歧视的犹太妇女、吉普赛妇女和其他妇女历史



的研究。这些妇女不仅不同于那些多数民族的妇女，而且也不同于她们各个少数民族群体中的男性。

一方面，种族主义的语言与性别和性缠绕在一起，它含有性、血腥和暴力的混合特征。当时的纳粹反犹太主义也是“性的反犹太主义”。欧洲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德国的种族主义——进一步说是属于德国种族主义牺牲品的男人——表示，用种族主义的观点来看，“雅利安人”就是“男性中的西方人”。不理解种族主义中的社会性别含义就无法理解种族主义，因为它是构成的因素之一。反之，如果社会性别关系或性别歧视主义的分析包括了对种族关系和种族主义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获得新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个结果可能就是得出这样的观点：国家社会主义对妇女的政策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由“鼓励生育和母职崇拜”组成。相反，它是反对多生多育，崇拜父职，宣扬男子汉大丈夫，大规模地灭绝女人和男人。

历史不仅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经历。它不应仅仅用男性的或者似乎性别中立的视角来研究，而且要用女性的和含有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研究。这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上假定的其他人类关系比社会性别关系更重要，建立一套相反的主张，说社会性别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虽然很清楚许多历史发现都是矫枉才能过正。然而，它意味着社会性别关系与其他的人类关系一样重要，社会性别关系能对其他的人类关系产生影响。反过来，所有的其他人类关系也能影响社会性别关系。

坚持假定其他的比社会性别关系更基本，在意识形态上和历史上都是无法讲通的。它使人想起 Christa Wolf 讲的一位国王的女儿 Cassandra。Cassandra 梦见她必须判断“月亮和太阳究竟谁更亮”。一位谦卑而聪明的女人教导她，“要为一个完全荒谬的问题寻找答案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尝试”。当 Cassandra 最后终于明白了她“有权利，也许甚至有义务拒绝这个问题”，她就迈出了理解她自己的历史过程中重要的和解的一步。

(蔡一平 译)